

超越事实验证： 数字媒体时代的事实核查与认知美德

● 闫文捷 李振宇

摘要：数字新闻业的情感转向在激发受众参与的同时，也招致了虚假信息的扩散。事实核查作为回应这一挑战的新闻样式和实践形式应运而生，并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和期待。本文在论述事实核查新闻业的规范性理念与公共价值的基础上，分析了事实核查在当下实践中所面临的多种困境和可能的革新方向。本文由此提出，事实核查新闻业应当超越对事实性信息的验证与提供，通过深度嵌入现代公民教育机制，成为涵养集体性认知美德和培育公民理性的践行者和推动者。

关键词：事实核查；数字新闻；情感转向；认知美德；新闻认识论

一、引言

在新闻专业精神的指引下，客观性被长期奉为新闻业核心的伦理规范之一，深刻影响着从业者对自身角色的想象和实践。^[1]沿循这一理念，理想情境下的新闻报道应以理性、冷静、非个人化的方式呈现事实，情感及其表达则因被视作威胁新闻客观性的潜在因素而被专业新闻理念和实践所习惯性地排斥。长久以来，新闻从业者始终被期待承担起“超然观察者”（detached observer）的角色，依靠自身审慎的理性分析而非个人化的情感表达来呈现和关怀社会现实。^[2]然而，这种角色定位也遮蔽了新闻从业者自身情感劳动的可见性，并斩断了新闻业与情感之间本就存在着的内在关联。数字技术的发展演进以及社交媒体平台的崛起，为重新划定情感在新闻生产与消费过程中的位置提供了新的契机。情感逐渐从被忽视的边缘地带，转而成为一种可被征用的传播资源。这种转变不仅影响了新闻的生产方式，极大增强

了情感在数字新闻业中的可见性，也带来了关于记者角色认知的变化和新闻业商业模式及组织文化的调整^[3]，同时重塑了传统新闻受众的角色定位及其舆论影响力。

如今，更多的研究者认为，情感始终贯穿于新闻业运作的各个阶段和领域。实际上，在数字新闻生产的日常实践中，即便是最典型的“硬新闻”，其叙事结构和选题逻辑也往往包含着诸多情感性元素。^[4]与此同时，新闻受众更是通过自身的行动方式和情感表达，形成了一种新的公共话语的表达形式。无论是新闻从业者还是研究者，都已不能回避数字新闻业正在经历着“情感转向”这一基本现实。情感业已成为数字新闻业自身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既可能赋予抽象的社会议题以具体可感的叙事形态，从而有效激发社会公众对公共议题的卷入，也可能沦为政治行为体与利益集团用以煽动仇恨、制造虚假信息的策略性动员工具，进而侵蚀理性讨论赖以维系的话语空间。正是这种矛盾和张力，使情感成为理解当代

新闻实践的重要变量。正如新闻学者瓦尔·乔根森 (Kerin Wahl-Jorgensen) 所言, 数字新闻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认识论的转变, 它为更加情感化和个性化的公共话语开辟出新的空间。^[5] 在这一背景下, 如何在日趋情感化的传播环境中捍卫公共话语的理性基础, 成为新闻研究者和实践者需要直面的理论问题和现实挑战。

此类挑战的表现之一便是在情感因素日益充斥的数字媒体环境中, 假新闻和错误信息等虚假信息借由社交媒体平台迎合公众情感需求的机制设计^[6], 使得事实和真相在影响公众认知态度与行为表现等方面的作用被普遍削弱, 而利用人们既有信念的情感化传播则愈发流行。面对这一时代症候, 事实核查作为一种新兴的新闻样式和实践形式应运而生。在中国, 从事事实核查的行动者基于各自不同的机构性质与组织形态, 发展出表现各异的核查运作模式, 在数字媒介体制中发挥着韧性维系与复原的作用。^[7] 事实核查面对数字新闻业情感转向的趋势, 也就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任务。作为一种理想的新闻实践形式, 如何可能在情感干扰、信息过载与立场分裂的公共空间中重新建立开放对话的基础? 事实核查又如何可能超越核验与提供事实性信息的功能, 进而成为培育公民素养和理性精神的实践形式? 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 不仅关乎事实核查在现实场景下的实际效用, 更涉及新闻业之规范理想和功能价值的实现。

二、事实核查的规范理想与公共价值

作为一项新兴的新闻样式, 事实核查之所以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较为广泛的认可并迅速在诸多国家和地区得以被制度化地实践, 不仅在于其辨伪识真的信息纠错功能, 更因为它承载了在公共生活中追求理性与真相的规范理想。认识并

理解这些职业规范, 是审视事实核查的实践效果及其可能性的前提。

(一) 事实核查的规范性理念。区别于常规类型的新闻报道, 事实核查新闻文本的叙事焦点发生了明显转移: 它不再以满足传统的新闻要素并告知公众“发生了什么”为核心要务, 而是从回溯性的视角出发, 强调对已发布的特定声明进行事实查证。^[8] 事实核查将新闻业对真实性的承诺从抽象的职业伦理及新闻生产的“后台”规范迁移至可被受众感知的“前台”叙事之中。叙事焦点的转移, 自然带来新闻工作者操作规范和自我认识的调整。^[9] 专业的事实核查工作者需要时刻区分事实性宣称、主观意见与价值判断, 秉持非党派性的立场, 不为某一方立场背书, 从而对公共言论做出准确、客观的事实性判断。这种非党派性不仅体现在对新闻议题和被核查对象及其声明的选择上, 更体现为试图使核查结论不受政治立场约束而付出的努力。

为了使真实性承诺足以令人信服, 程序透明性成为事实核查实践的基本遵循。^[10] 事实核查从业者借鉴并采用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论^[11], 发展出一整套从识别可疑言论、追溯相关信源, 到交叉核验证据、审慎推导结论的核查程序与准则, 以期向公众展示自身的专业性及其核查结论的可靠可信, 并力求核查结果经得起公开检验。的确, 借助形式不一的核查实践, 公众可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事实查证的协作过程中, 而非单纯被动地接受由核查员得出的“权威”结论。对程序透明性的遵循也意味着, 事实核查不再只是新闻工作者对新闻事实的报道, 更是一种围绕新闻业如何确定和呈现新闻真实而面向公众做出的实践展演和邀约。^[12]

不可否认的是, 事实核查从诞生发展至今始终伴随着诸种争议。批评者常常把矛头指向“事

实”概念本身，认为事实核查的倡导者预设了一种天真的实证主义认识论——假定存在着某种独立于观察者、等待被发现的客观实体^[13]，而事实核查的工作就是通过遵循一套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将其发掘解释出来。然而，承认事实本身的建构性，并不意味着滑向相对主义的另一端。事实核查的正当性，首先在于它能够在纷繁芜杂的公共信息中做出一种关键的区分：将可观察、可验证的经验性宣称，与涉及意义阐释和价值判断的解释性框架区别开来。在此基础上，事实核查不以追求并提供“正确答案”作为终极目标，而旨在通过澄清作为论证基础之经验宣称的真实性，对随意的意义阐释和价值判断加以约束，从而力求公共讨论得以在一个可被验证的经验基础之上深入展开，为公众舆论乃至社会公意的形成构建一个适度的认知门槛和共享的社会知识库。

可以说，在媒体公信力整体式微的当下，事实核查的规范性要义正是源自它对新闻真实性与客观性原则的捍卫，对程序透明性义务的遵循，以及对重建社会公意基础、重构公众与新闻业之间信任纽带的追寻。它同时向公众传递出以上价值理念不再仅仅是一套新闻业内部所推崇的规范性承诺与目标，同时更是可见、可参与、可检验、可复现、可追责的社会实践。

(二) 事实核查的公共价值。倘若将事实核查简单理解为一种应对虚假信息的操作工具，那便可能错失对其深层功能与价值的叩问。事实核查领域的研究者一方面致力于追问数字时代的新闻业如何生产真实可信的公共知识，另一方面也热衷于探究公众如何确知自己所知为真。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研究者首先需要明晰事实核查影响个体认知和社会知识的介入方式。

诸多研究显示，虚假信息之所以能够误导受众，并非单纯由于信息供给端存在的质量缺陷，

更在于这类信息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人类信息处理的固有心理机制。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来看，人类的信息处理过程天然地受到一系列认知偏见的影响。譬如，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使人们选择性接收那些符合自身既有信念的信息^[14]；启发式（heuristics）顺应了人们的认知捷径，以牺牲决策准确性为代价来换取思考速度和便利性^[15]；动机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则促使人们基于自身的情感反应或身份认同完成对信息的处理和判断。^[16] 这些认知偏见通常内嵌于人类先天的信息处理机制之中，因此对人们识别虚假信息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在先天“不良”的认知机制之外，受众媒介素养的匮乏和对信息进行批判性审视之能力的欠缺则构成了后天养成中的不足。媒介素养包括人们对信息真实性进行查证的知识储备和技术能力，更涉及批判地认识和理解媒体在新闻生产和媒介体制结构等方面存有潜在偏向的能力。^[17] 多项研究表明，面对复杂的数字信息环境，媒介素养水平低下的个体在进行信息判断时往往难以抑制自身固有的认知偏见，由此导致他们更易于误信并与他人分享虚假信息。^{[18][19]}

面对这些现实难题，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强调，事实核查不仅有义务向公众提供“何谓真实”的答案，并且对于涵养公众媒介素养具有天然的教育意义，是社会媒介素养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0] 基于中国网络用户样本的研究显示，常规性事实核查与新闻素养的宣导相结合的确可以有效帮助人们辨伪识真，即便在未接受新闻素养外部干预的情况下，参与事实查证这一行动本身即可能在公众既有的新闻辨识力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其辨别新闻真伪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参与事实核查便已具备一定的媒介素养教育功能。^[21]

除了成就媒介素养教育以外，有研究者进而

提出，在数字媒介社会中，事实核查正在基于人类判断、机构规范和算法等技术中介的合流，成为塑造公共知识和公民信任的认知基础设施（epistemic infrastructure）。这套基础设施由底层的社会技术系统、制度安排和程序规范构成，不仅仅是一系列用于验证信息真伪的程序性任务，更植根于社会的知识生产体系之中，主动干预着知识的建构、评估和传播。^[22] 在传统知识权威屡遭质疑的当下，作为人类社会认知基础设施的事实核查通过深度卷入社会成员关于何谓真实、什么可信、谁又拥有定义真实与可信的权威和权力等一连串社会根本性问题的协商与理解，不仅影响着公共知识的生成，也因此肩负着抵抗虚假权威、确立正当权威的重任。值得强调的是，事实核查所守护的不是某种特定知识及其生产者的权威地位，而是知识得以获得权威所需的规范性和程序性条件。至此不难看出，事实核查的社会功能远不止于单一的事实查证，它可能对社会成员媒介素养的养成、社会范围内公共信息的流动、知识宣称正当性和权威性的确立，乃至信息生态整体韧性的维系与提升产生深刻的影响^[23]，也因此而具备了更深远的公共价值与意涵。

三、事实核查的困境与突破

（一）事实核查的现实困境。与研究者所寄予的规范性期待相比，事实核查在实践中面临诸多现实的制约和挑战。挑战首先表现在，专业事实核查从业者希望凭借在事实性宣称与观点立场之间做出辨别以实现事实核查新闻的客观性，然而，现实中的事实核查绝非价值无涉的真相仲裁者。事实核查工作者时常遭遇公众对其立场偏向的质疑，这也进一步削弱了事实核查新闻业的可信度与正当性基础。政治学者乌辛斯基和巴特勒（Joseph E. Uscinski & Ryden W. Butler）从认识论层

面指出，政治领域的真实性宣称往往具有复杂的可诠释性，事实与价值判断相互交织，因此真假二元论无法有效且充分地捕捉这种复杂性。^[24] 不难想象，当事实核查进入那些本就充满认识论争议的复杂议题时，它所主张的客观性立场在实践中往往难以为继。此外，由于事实核查在操作层面不可避免地需要核查员做出主观判断^[25]，其对自身客观性的宣称通常也只能诉诸一系列的修辞策略^[26]，由此难免将事实核查引向“元核查困境”，使得“谁来核查核查者”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在民粹主义风潮在欧美社会全面复兴并席卷全球的当下，专业事实核查工作者为维护自身客观性所做出的努力轻而易举便可被特定群体污名化为精英话语的象征，反而在实际上起到了加剧行业正当性危机的效果。

事实核查在认识论层面的困境，往往在具体的传播实践中被进一步放大。要实现事实核查新闻所秉持的规范性理念，有赖于公众对这一新闻实践乃至整个新闻业的关注与信任。然而，面对数字媒体环境中无处不在的阴谋论、反智主义与反媒体情绪，试图在分裂的情感空间中为公共话语寻求理性基础的事实核查，可能比传统新闻形态面临更为严峻的信任危机。一项对事实核查工作者职业困境的研究发现，相较于传统的新闻记者，事实核查员往往会遭遇更严重的人身攻击、死亡威胁和人肉搜索等网络暴力，也因此承受着更加沉重的负面情感负担。^[27]

然而吊诡的是，为了争夺受众有限的注意力资源，事实核查内容本身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情感化表达。一项对美国事实核查机构在 Facebook 上所发帖文的实证分析显示，从 2017 年到 2022 年，情感元素在事实核查帖子中的使用量增加了 13.5%，并且增幅在总统选举、新冠疫情暴发等重大外部事件发生期间尤为显著。尽管情感化更

易于推动广泛的公众参与，但也可能因此而强化公众对被核查对象的负面评价，进而损害他们对该核查对象所发布的真实信息的接受意愿。^[28]这种矛盾意味着，事实核查的情感化可能直接威胁到专业核查工作者所一贯推崇的客观性原则，导致事实核查逐渐背离它澄清事实、减轻错误信息对公众造成的误导，最终维护公众知情权的初衷。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事实核查的实际效力有赖于成熟有利的经验条件。在面对的未知事件存在信息真空和高度的科学不确定性，抑或缺乏权威信息与制度性信任时，事实核查往往难以提供可靠的替代性叙事。^[29]也就是说，事实核查虽为应对虚假信息的必要手段，但却并非破解时代难题的万灵丹，它需要超越真实与虚伪的二元框架，转而正视人类情感、价值观、信任和不确定性等多种因素的复杂作用。^[30]

对事实核查所面临的现实困境的追问指向一些更为深层的问题：在情感化的公共话语空间中，致力于追寻理性认知的事实核查究竟可能扮演何种角色？它是否可能、又如何能够培育出一种与数字媒体环境相适应的公民理性？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不仅有赖于对事实核查认识论预设的反思，更需要被放置在科学技术已被新闻业深度征用并融合的大背景下来考量。要知道，尽管外部的限制性力量为事实核查抵近其规范性理想设置了重重障碍，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在现实中能够取得的实际成效，但事实核查新闻业的生命力恰恰源自它持续性的自我审视，以及面对挑战时所做出的不断调适与完善。

（二）事实核查的革新与发展。如前所述，事实核查通常着力于以提供证据并展示论证的方式对错误的信息内容做出驳斥和纠正。这种事后纠错的偏好植根于事实核查所遵循的实证主义认识论，强调事实作为一种独立于观察者、等待被

核查者发现并验证的客观实体而存在。^[31]然而，有学者提出，尽管新闻“客观性”的传统由来已久，但围绕这一概念所形成的整个认识论体系存在谬误：人类要想获取有关现实的客观知识，必然涉及对事实的认识和筛选，但实际上，人们既无法在脱离先验概念的情况下纯粹地感知事实，也无法在抛弃价值判断的情况下选择事实。^[32]不仅如此，新闻工作本就是情理交汇的实践^[33]，事实核查亦无法做到将事实判断与情感因素全然剥离，在面对数字新闻业“情感转向”的当下尤为如此。

为此，传播学研究者苏奥马莱宁（Kari Suomalainen）等人提出，价值引导人们对事实的判断，二者之间不容易划分出清晰的界限，因此事实核查不必在客观事实与主观意见之间做出严格区分，而完全有可能在持有价值判断的同时保持一种“务实的客观”（pragmatic objectivity），以此来回应上述围绕事实核查认识论的批评。为此，新闻工作者一方面需要凭借严密的方法设计与操作流程尽力抵近事实核查的客观性标准，另一方面，则要坦承核查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主观因素的影响，并对这些主观成分进行透明化处理，使其接受公众审视。具体到操作层面，事实核查工作者在核验信息内容时，应借助三角验证（triangulation）——即对多个信息来源进行交叉核查，来完成对不同数据来源的审视和对各种合理解读的考量，同时围绕为何在核查中使用主观判断以及为何得出现有的裁决等问题做出必要的解释。^[34]这些做法有助于在保留核查主观性空间的同时，借助严谨的方法与透明的程序来保障事实核查结论依旧可靠。

务实而客观的事实核查还强调借助广泛的受众参与来提升核查工作的透明度，以此减轻核查中的偏见，并可能在不同的真理体制（truth regimes）之间建立联系。^[35]现实中，事实核查新

闻业发展至今早已呈现出跨越机构边界 (institutional boundary) 的特征, 不仅吸纳了传统新闻机构的专业资源, 而且和学术团体、技术平台等非传统行动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36] 在域外, 以国际事实核查网络 (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 为代表的行业联盟的建立, 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职业准则在跨国语境中的协商、确立及制度化发展。在国内, 基于参与式协作而开展的事实核查不仅常见于澎湃新闻等专业机构所主导的事实核查服务中, 而且其核查效果已得到研究者初步的实证检验。^[37] 多元协作不仅有助于分担单一事实核查机构所面临的资源压力, 弱化由于公众对特定核查机构的信任缺失而给整个事实核查新闻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更可能在不同的参与主体之间形成资源互补与相互监督, 推动确立一整套兼具可比性与公信力的核查标准, 从而增强事实核查新闻业的系统韧性。

除了多元主体的参与, 传播技术在事实核查新闻业的发展中亦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不仅在核查过程中被愈发普遍而深度地征用, 还可能进一步深入影响事实核查的实践逻辑和步骤。^[38] 在虚假信息的检测方面, 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流可以被实时导入由人工智能技术所驱动的分析系统, 帮助识别包含虚假信息的可疑内容并追踪其传播路径和情感成分, 继而将经过 AI 系统筛查后的信息内容推送给事实核查人员。而在虚假信息的验证层面, 对于某些模式化、识别特征明显的虚假信息 (如已被多次辟谣的虚假内容), 自动化事实核查系统可依据这些识别特征将其与数据库中的既有结果进行自动匹配, 在超短时间内实现对虚假信息的快速响应。借助技术工具, 普通公众也可能在不同阶段、以不同方式更便捷地参与到事实核查过程中来, 从而大幅降低公众参与事实核查的门槛。

随着传播技术在事实核查领域的深度应用, 新的工具手段在渗入调整事实核查的逻辑步骤之外, 甚至可能重塑其认识论基础。^[39] 已有研究强有力地揭示出, 事实核查难以通过宣告真相的方式改变普罗大众的固有信念, 但它可以通过一套开放、透明、可复制的程序, 为公共讨论提供认知参照。^[40] 这种认识论上的更新, 强调核查实践需兼顾程序透明、多元参与和人机协同, 要求核查实践者积极关注并主动识别技术介入带来的认知风险, 保留人类核查员在事实核查关键环节 (如确立复杂声言的评判标准与最终裁决) 的决策权和监督权, 并通过主动与受众沟通来回应各方可能的疑问。由此, 通过公开展示工作过程、邀请公众提出建议与修正意见, 事实核查实践得以被建构为一种可审视、可参与的公共对话形式。^[41]

当然, 技术的深度介入也可能为事实核查的实践运作增添诸多难以预测的隐忧。如何保证经由技术检测、识别和判定的核查结果不因算法偏见而出现结论失真? 如何避免技术开发者借助自动化事实核查系统而强化自身对公共话语的垄断? 又如何避免因核查工作的即时性压力而抛弃事实核合理应具有的批判性价值? 这些问题仍有待新闻传播的研究者和行业实践者做出持续不断的探究与回应。

四、结语：事实核查与公民理性的培育

事实核查新闻业发展至今, 每一次在方法手段上的更新, 都与它在新闻认识论层面的演进相互渗透, 彼此滋养。相较于自然科学, 新闻业因其直面大众的需要而使得本领域内专业知识的积累相对开放, 然而也正是这种开放性, 使得围绕“何为好新闻”的认知争论始终持续不休。^[42] 在传统认知中, 缘起于政治领域的事实核查, 从专注于核验政治人物声言的准确性进而转向揭穿并

纠正假新闻、阴谋论和各种社交媒体上的假消息，旨在为公众提供客观准确的公共信息与社会知识，以此强化公共问责、服务社会运转。^[43]这套以真实、客观和公共问责等专业新闻规范为基石的认识论强调对权威保持批判性的距离，纠正虚假信息优先于确认已知内容^[44]，它同时预设了一个理性公众的受众形象——受众应当具备接纳核查结论的开放态度，能够基于客观事实调整认知信念，并将内容真实性作为形成个人信念与判断的重要标准。

而现实的境况是，对数字媒介社会中看重情感共鸣和身份认同的受众而言，情感及其动员已借由社交媒体等平台界面及其技术逻辑，深度卷入人们认知态度和价值评判的形成过程。事实核查的核心功能固然包括提供事实性信息，但核查工作不应止步于此，它还是一种以声言事实性核验为中心，组织和贯穿新闻活动的社会实践，既重视打击错误信息和促进公共话语的准确性，也应以新闻活动观照社会公众认知能力的整体性提升为己任。概而言之，事实核查应成为社会认知免疫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面向公众公开判断，以透明、可重复的方法程序邀请公众和其他机构复现事实核查结论，也承认自己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以此协助公众更好地识别并抵御情感操纵和认知偏见。这一功能拓展的要义在于从告知公众“何为真实”，进一步发展为鼓励并帮助公众反思“何以为真”。在这个意义上，事实核查需要超越既有的信息核验和纠错的工具性定位，通过探索并深度嵌入现代公民教育机制，拓展实现自身制度化实践的多元路径。

我们希望再次强调，事实核查的意义不止于提供有关信息真伪的判断，更在于培育公众持久的认知能力——一种能够在情感与理性之间保持审慎、在不确定性中坚持探索的内在品质。这种品质与哲学认识论中所强调的思想开放，认知

勤勉，智识谦逊、好奇而坚韧等认知特点一脉相承，都是构成人类“认知美德”（epistemic virtue）的良好特质。^[45]在哲学家蒙马尔凯（James A. Montmarquet）看来，即便人们在主观上渴望真理，但仍有可能由于采用了错误的方式而滑向认知狂热或封闭的极端，唯有在认知美德的协调下，人类才更有可能成为负责任的认知主体。^[46]

事实上，事实核查实践已经蕴含了认知美德的基本要素：当核查者坦然承认自身判断的局限、展示核查过程的完整轨迹，同时接受随着新证据的出现而调整结论时，他们所示范的正是一种智识上的谦逊与求真意志。如果我们从个体实践进一步上升至组织层面，则可以看到，专业事实核查机构在恪守职业伦理准则、维护核查透明度、展开跨组织交流与合作以及推动受众参与等方面已具有普遍共识，这些均有助于将唯真、开放、审慎、诚实等品格特质深度注入行业肌理，并由此推动集体性认知美德（collective epistemic virtues）的养成。^[47]作为社会群体或共同体在认知层面富有价值的品质和特征，集体性的认知美德并非个体美德的简单加总，而需要在成员间持续的共同承诺与连结行动中培育养成。事实核查新闻业通过展示并呼吁公众注重证据、尊重事实、接受更正，这不仅有助于公众求真唯实和自我反思之精神的习得，更显示出作为一种现代公民教育的内容与形式在平衡个人与集体、实践与规范，在将教育目标从知识获取转向认知美德的涵养，进而在推动公民理性之养成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潜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事实核查不仅可以被视作数字媒体时代中事实真相的守护者，更应成为致力于培育审慎而开放、谦逊而坚韧、勇敢而自省的现代公民之教育行动的践行者和推动者。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社交平台虚假信息治理模式比较研究”（批准号：21BXW065）成果】

参考文献：

- [1] Wahl-Jorgensen K, Pantti M. Introduction: The emotional turn in journalism[J]. *Journalism*, 2021,22(5):1147-1154.
- [2][4] Wahl-Jorgensen K. An emotional turn in journalism studies[J]. *Digital Journalism*, 2020,8(2):175-194.
- [3] Lecheler S. The emotional turn in journalism needs to be about audience perceptions: Commentary - virtual special issue on the emotional turn[J]. *Digital Journalism*, 2020, 8(2):287-291.
- [5] Wahl-Jorgensen K. Questioning the ideal of the public sphere: The emotional turn[J]. *Social Media + Society*, 2019,5(3):2056305119852175.
- [6] Martel C, Pennycook G, Rand D G. Reliance on emotion promotes belief in fake news[J]. *Cognitive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Implications*, 2020,5(1):47.
- [7] 刘于思, 闫文捷, 周睿鸣. 作为媒介体制韧性要素的事实核查: 中国实践与全球经验[J]. *青年记者*, 2023(23):9-12.
- [8][11][39] Dierickx L, Opdahl A L, Bjerknes F, et al. What is a fact in the age of generative AI? Fact-checking as an epistemological lens[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26:1-18.
- [9] Graves L, Konieczna M. Qualitativ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sharing the news: Journalistic collaboration as field repair[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5(09):19.
- [10] Dierickx L, Lindén C G. Transparency and fact-checking in open societies[J]. *Journalism*, 2026,27(1):202-220.
- [12][13][34][35][41] Suomalainen K, Nykänen N, Seeck H, et al. Fact-checking in journalism: An epistemological framework[J]. *Journalism Studies*, 2025,26(10):1129-1149.
- [14] Nickerson R S. Confirmation bias: A ubiquitous phenomenon in many guises[J].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1998,2(2):175-220.
- [15] Lenat D B. The nature of heuristics[J].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982,19(2):189-249.
- [16] Kunda Z. The case for motivated reasoning[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0,108(3):480.
- [17] Koltay T. The media and the literacies: Media literacy, information literacy, digital literacy[J].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11,33(2):211-221.
- [18] Craft S, Ashley S, Maksl A. News media literacy and conspiracy theory endorsement[J].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2017,2(4):388-401.
- [19] Ford T, Yankoski M, Facciani M, et al. Online media literacy intervention in Indonesia reduces misinformation sharing intention[J]. *Journal of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2023,15(2):99-123.
- [20] Mesquita, L., Maneta, M., Brites, M. J. Beyond verification: The evolving role of fact-checking organisations in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for youth[J].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2024,12, Article 8690.
- [21][37] 闫文捷, 李振宇. 作为集体探究的事实核查: 公众参与和素养宣导的力量[J]. *国际新闻界*, 2025,47(9):6-26.
- [22][23] Shin D, Perlmutter D D, Lim J S, et al. Fact-checking as epistemic infrastructure: From journalistic gatekeeping to platform governance[J]. *Emerging Media*, 2025,3(2):183-202.
- [24][31] Uscinski J E, Butler R W. The epistemology of fact checking[J]. *Critical Review*, 2013,25(2):162-180.
- [25] 郑佳雯. 开放的探索: 事实核查实践与公共生活的相互依存——以“NUJ核真录”为例[J]. *新闻记者*, 2020(08):20-31.
- [26] Bengtsson M, Schousboe S. And that's a fact: A rhe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role of fact-checkers[J]. *Journalism Practice*, 2024, 18(9):2414-2432.
- [27] Roberts J, Koliska M. The toll of fighting misinformation: Precarity in fact-checking work[J]. *Journalism*, 2025:14648849251355817.
- [28] Xue H, Zhang J, Zhang X. Facts or feelings? Leveraging emotionality as a fact-checking strategy on social media in the United States[J]. *Social Media + Society*, 2025,11(1):20563051251318172.
- [29] Chou W Y S, Gaysynsky A, Vanderpool R C. The COVID-19 misinfodemic: Moving beyond fact-checking[J]. *Health Education & Behavior*, 2020,48(1):9-13.
- [30] Krause N M, Freiling I, Beets B, et al. Fact-checking as risk communication: The multi-layered risk of misinformation in times of COVID-19[J].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2020,23(7-8):1052-1059.
- [32] Muñoz-Torres J R. Truth and objectivity in journalism: Anatomy of an endless misunderstanding[J]. *Journalism Studies*, 2012,13(4):566-582.
- [33] 周睿鸣. 新闻研究的情感转向: 全球议题与在地议程[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4,31(1):36-50+126-127.
- [36] Graves L. Boundaries not drawn: Mapping the institutional roots of the global fact-checking movement[J]. *Journalism Studies*, 2018,19(5):613-631
- [38] Westlund O, Larsen R, Graves L, et al. Technologies and fact-checking: A sociotechnical mapping[J]. *Disinformation Studies*, 2022:193-236.
- [40] Walter N, Cohen J, Holbert R L, et al. Fact-checking: A meta-analysis of what works and for whom[J].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19,37(3):350-375.
- [42] Carlson M. Epistemic contests in journalism: Examining struggles over journalistic ways of knowing[J]. *Digital Journalism*, 2023,13(3):362-377.
- [43] Amazeen M A. Revisiting the epistemology of fact-checking[J]. *Critical Review*, 2015,27(1):1-22.
- [44] Steensen S, Kalsnes B, Westlund O. The limits of live fact-checking: Epistem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introducing a breaking news logic to political fact-checking[J]. *New Media & Society*, 2024,26(11):6347-6365.
- [45] Kornblith H. Justified belief and epistemically responsible action[J].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983,92(1):33-48.
- [46] Montmarquet J A. Epistemic virtue[J]. *Mind*, 1987,XCVI(384):482-497.
- [47] Lahroodi R. Collective epistemic virtues[J]. *Social Epistemology*, 2007,21(3):281-297.

(闫文捷: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李振宇: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